

# 容闳金陵之行与西方传教士

李吉奎

1860年容闳金陵之行，在其自传体回忆录《西学东渐记》有专章记述，他提到此行是应美国之传教士之邀，但未记传教士之名。英国传教士杨笃信（Griffith John）在其通信中称此行同去的是一位具有良好教养和观察力的中国人，同样也未注明此中国人的名字和活动。对于传教士和容闳来说，金陵之行并非即兴之作，而是各有政治目的的举措，机缘促使他们成了同路人。本文拟在学术界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对他们此次金陵之行，进一步进行梳理。

太平天国赖以发动民众反清的拜上帝会，由于它被西方人士认为与他们是同一信仰，故他们怀着好奇的心情想了解它、改造它，并利用它作为在华扩张的工具。从1853年6月开始，便有西方传教士与太平天国方面联系，最早的大概就是美国监理会戴作士（Charles Taylor）医生。到了1860年，形势发生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已接近尾声，洪仁玕于1859年3月抵天京，随后被洪秀全委以重任，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因为太平军占领了苏杭，进窥上海，有与西方在华势力接触的必要性。

先是，洪仁玕于1854年曾经在传教士帮助下企图从苏南进入天京，但未如意，返回香港。在上海期间，洪仁玕与艾约瑟（Joseph Edkins）、杨笃信、慕维廉（William Muhead）等传教士建立了友好关系。在1858年动身赴天京之前，他在香港住了约4年，

学习天文知识。在他原来交往的传教士韩山文去世后，他被伦敦布道会所接受，做了该会的传道师。进入天京之后，据说上述传教士曾写信向他表示祝贺。洪仁玕给艾约瑟复信，并邀他来做客。函谓：“昨知先生有书一通致忠王李弟，讲明真理，足见同道之人，自有同心，故余来苏省延候大驾，务望玉趾惠临，以便面倾一切”云云。李秀成在复艾约瑟、杨笃信函中亦表示，“兹承明论见贻，实足开余茅塞，私衷欣喜，莫可言宣。然既承惠我好音，谅必不吝移玉，惠然肯来，面倾胸臆。”并告干王已来苏州，欲与会晤，讲论壹是，“但其中事宜多有必须面罄之件，特此敬修启复，望阁下亲降苏省，俾得面与干王定议一切。”这两封信分别发于太平天国戊申十年六月十一、十二日，即1860年7月28、29日。按从李秀成函中所称“早拟致书通候，同证道源，只以残妖待诛，道路梗塞，致疏音问。现仗天威，攻克苏杭，与阁下相拒（距）不远，亟欲遣一介以通好，又以军务未暇，迟迟未发。乃承锦翰先颁，讲明真道”<sup>①</sup>云云，可见这些传教士还未去过苏州。在6月23日去苏州的，是美国南浸会传教士高第丕（T·P·Crawford）等人。这批传教士带回致英美法三国公使，要求他们承认太平天国的照会，而干、忠二王发出邀请，且叙明要议多事，看来还是希望他们作为一种渠道，沟通与列强的关系。

8月16日杨笃信向伦敦会秘书戴德曼报告，详叙此次苏州之行。杨笃信在报告中写道：“我于前信中曾告诉你，我从苏州收到两封信，一为干王洪仁玕给艾约瑟的信，另一为忠王给艾约瑟和我的信，邀请我们去苏州会晤干王。我们觉得，作为基督教的传教士，对于这个邀请是无法加以拒绝的。我们急欲会见这个人，为了查明我们关心的各项问题的真相，为了鼓励他以他那可赞美的努力

<sup>①</sup> 《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730页。

去纠正与运动有关的各种错误，为了了解我们如何才能把真理散播到他的人民中去，同时也为了请他考虑我们所提出的一些计划和改进办法。”

该信接着谈到他们一行四人在7月30日从上海出发沿途所见的情形，说他们经过的地方，“大部分乡民都在田里像平日一般地工作着，市镇和村庄则显示了十分惨淡的景象，昔日的繁华市场已完全荒芜，成千的房屋全都焚毁倾圮。到处可以见到孤独的老翁和老妪，在废墟瓦砾中慢慢地、颤慄地走动，对着四周的荒凉惨象注视啜泣。在这些地方，不断地可见到尸体，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对于目前的惨象，杨笃信认为，“不要忘记，大部分焚毁的房屋是太平军未到以前清军所烧掉的，只是出于自卫，同时，因自杀而死的人远比被杀死的人多。虽然太平军也有残暴行为，可是总比清军的行为好。”他们见到太平军与人民在做买卖，而太平军买一切东西都是照价付钱的。

杨笃信一行在8月2日早上抵达苏州，当天和干王见面。他们谈到宗教问题和往事，也表示他想要从事宗教工作，但洪秀全不同意。

在第二次会晤中，他们继续谈论各种事情，特别是洪秀全的性格。临别时，传教士们把带去的一些《圣经全书》和许多宗教论文选送给洪仁玕，洪还“祈祷一切偶像将消灭，寺庙将变成为教堂，纯正的基督教将变为中国的宗教。”“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景象，一种难以忘怀的景象。”<sup>①</sup>

杨笃信对太平天国产生了较佳的印象，特别喜欢干王本人。他希望有许多传教士到南京来教导人民，表示“要是你们愿意来，我可以为你们预备礼堂，劝人去做礼拜，我自己也要经常参加。”这

<sup>①</sup> [英] 呤喇著，王维周、王元化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232页。

个邀请颇具魅力，所以传教士们有 11 月份的金陵之行。

关于传教士们的金陵之行，1861 年 2 月 19 日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致外务大臣罗塞尔书中提到，“杨笃信先生，一位有教养有才智的英国传教士，于两三月前自上海前往苏州，再由苏州前往南京，并在南京逗留了七天”。“在苏州，杨笃信先生曾和同去的一位具有良好教养和观察能力的中国人，曾经见到有土地的绅士们成群结队到民政长官那里去表示他们对于太平天国的忠诚拥戴，我曾向这位中国人详细询问这件事。”<sup>①</sup>

密迪乐在这里所说的一位具有良好教育和观察力的中国人，指的便是容闳。容闳与杨笃信等人赴金陵之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传教士罗孝全（《西学东渐记》译作劳白芝 Rev·Roberts）在 1860 年 10 月已到了金陵，这就为其他传教士前往金陵形成一种迫切感。另外，1860 年 10 月 13 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根据 10 月 24、25 日先后签订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侵略者攫取了一系列殖民权益，中外关系行将调整，所以传教士们也急于赴金陵一行。

据容闳记载：“1860 年，有二美教士，不忆其名，一中国人曰曾兰生，拟作金陵游，探太平军内幕，邀予与偕。予欣然诺之。太平军中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此余所亟欲知也。”<sup>②</sup> 由此可知，容闳此行，也是有目的的。

他们一行于 11 月 6 日从上海乘一艘称作“无锡快”的快艇出发，这种船因在无锡县所制造，故名。这种船在当时被称为交通利器。为避开清军阻挠，他们绕开松江，“舟离上海三十英里中，沿途居民安堵，不显有政治上扰乱情状。田家操作自若，方收获也。”

<sup>①</sup>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 375、376 页。

<sup>②</sup> 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88 页。

11月9日早上，船抵苏州娄门，在一军站中领了护照（欲入城者于此先领照，出城时缴还）。然后联系城中主将，乞介绍书以便赴金陵。入城后，得见军事首领刘某（可能是刘肇钧）。容闳谓此人“有骄矜气”，印象欠佳。但他们虽被反复盘诘，却礼遇尚优。他们领到了函件及护照，可畅行于无锡常州间，无可留难。

11月11日早上抵无锡，得其地主将礼遇款待。12日离无锡赴常州。“自苏州至丹阳，舟皆行运河中。河之两岸，道路犹完好，途中所见皆太平军。运河中船只颇少，有时经日不见一舟。运河两旁之田，皆已荒芜，草长盈尺，满目蒿莱，绝不见有稻秧麦穗。”他认为不了解真相的人，必归咎于太平军，实际以他沿途所见，“太平军之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施以极严之军法。”容闳还写道：“自无锡至此，沿途房屋，皆空无人居。偶遇一二老叟，提小筐售物。筐中所贮桔、蛋、糕饼、菜蔬、鱼、肉等零星食品，见舟来，辄追呼求售。观其状，似因年老不能远逃，故借此以延喘息。然皆愁苦万状，穷蹙无生趣矣。”

13日早上6点钟，向丹阳出发。“丹阳居民，对于太平军较有信用，商不辍业，农不辍耕，无荒凉景象。而太平军之对于人民，亦未闻有虐遇事，相处甚得也。”是日傍晚抵丹阳，宿舟中。14日早入城。该城太平军主将姓刘，适外出，由副官秦某接待。在谈话中，秦副官讲到运河两岸荒凉的原因，一为清军败退时所焚，二为土匪所抢掠，三则太平军之自毁也。忠王竭力禁抢掠之风，悬重赏以募奇才，下令一不许残杀平民，二不许妄杀牛羊，三不许纵烧民居。有犯其一者，杀无赦。15日，他们取得了通行文书，船留丹阳，由太平军守护。16日徒步出丹阳、经宝堰赴句容，宿极陋之民居中，“土人皆贫苦不支，对于外来之客，尤怀疑惧。”17日9点钟，抵句容，“城门尽闭，不得入。盖此时适有谣传，谓太平军败于镇江，将来此暂避，故句容戒严。予等闻此大失望，美教士至

欲折回上海。余意必至南京，持论久之，乃复前进。幸离句容不远，觅得肩輿及骡，乃不复退缩。”

11月18日抵达南京。罗孝全传教士派几名仆人在途中等候，迎至其住所。该处靠近干王洪仁玕王府，罗孝全与其来客是旧友，热情叙旧，容闳则退至自己的卧室，因连日劳顿，略事盥洗即就寝。他在澳门读小学时即认识罗孝全，但这次会见他未发一语，亦未通报自己的姓名。他描绘罗孝全一副太平天国官员装扮：“所衣为黄缎官袍，足华式笨履，举步迟缓，益形龙钟”，不知是洪秀全的宗教顾问，抑或是太平天国国务卿？其实，他的职务是外务丞相，相当于司局级的干部。

11月19日，容闳与传教士来客晋谒干王。容与洪仁玕在1856年即在香港认识。洪当时是伦敦传道会职员，任中国牧师。洪仁玕当时表示，将来愿在金陵再得相见。洪仁玕接见客人时，对来客极表欢迎，尤其乐于与容闳相会。

在略事寒暄之后，洪即询问容闳对于太平军的观念如何？是否赞成太平天国政策措施而愿与之共事？容闳回答说，他此来初无成见，亦无意投身太平军，仅是来看望故人，以慰数年来晦明风雨之思。

在洪仁玕一再追问之下，他表示：“实无他目的，但得略悉金陵实在情形，一释传闻之疑，于愿已足。惟此次自苏至宁，颇有感触，愿贡其千虑一得之愚。”

容闳向洪仁玕所贡献的建议，一共七条：“一、依正当的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这仅是大略，至于如何实行，不是空谈一场所能告毕的。容闳又说：“倘不以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他

认为，度德量力，自己所能尽力于太平军的也就是这些了。

对于这七条建议，过了两天，洪仁玕邀客人进行第二次会谈，逐条进行讨论。显然，洪仁玕对这些建议极其重视，“第善善不能用，盖一薛居州无能为役，且此时诸要人皆统兵于外，故必俟协议，经多数赞成，乃可实行也。”洪仁玕居住香港前后达7年之久，虽然这是一个畸形的社会，不中不西，但它毕竟是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多少带有西方资本主义色彩。他本人曾提出《资政新篇》，也企图推行现代化，在当时环境下，同样也未能施行，更遑论容闳的七条建议了。

过了几天，洪仁玕派人送给容闳一个小包袱，里边是一个刻有容闳名字的官印及“义”字四等爵的委任书。容闳不能接受，在与同行传教士商量后，决定退还。并亲至王府致谢，而且对洪仁玕表示，无论何时，太平军领袖如实行他们第一次会谈时提出的计划，则他愿意奔走效力，无功受赏则不敢领受。希望干王能颁一护照，使得他能在太平军势力范围内，无论何时得自由来去。洪仁玕知其不能强留，便答应了下来，遂于11月24日发出护照，并替客人代备了粮食与马，送到丹阳。他们乘原船返上海，1861年1月初抵达。

容闳金陵之行，本来是有备而来的，希望在教育方面实现自己的主张，且赞助政治改良，为中国造福。但结果一切令人失望。不过，此行也加深了他对国情的认识，对太平军的了解，并对太平军的前途作出了估计。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即“1850年革命”之原因，其“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他断言：“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

他对太平军的宗教活动有着深入其境的考察，肯定它具有耶稣

教的种种“重大之要旨”，但外界评论则未免感情用事，过于信任。他认为太平军含有两重性质，起义之初，旌旗所向，无坚不摧；但自北伐之后，兵力减少，招来的新兵“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盖此等无赖之尤，既无军人纪律，复无宗教信仰。即使齐之以刑，不足禁其抢掠杀人之过恶”。而“锐气既挫，迨占据扬州、苏州、杭州等城，财产富而多美色，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而愈况。盖繁华富丽，固足以销磨壮志，而促其灭亡也。”他认为，太平军不但在宗教方面令人失望，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就是在中国政治上，更绝无革新的影响，“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不过，太平天国运动也还是有其作用的：“其可称为良好结果者惟有一事，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观于此后 1894、1895、1898、1900、1901、1904、1905 等年种种事实之发生，足证予言之不谬矣！”<sup>①</sup>

容闳对太平天国的评价，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既未对洪秀全一类的人刻意地描述，也不以个人的好恶去评判是非。他对太平天国运动是失望了，但他对中国并未失望，以后他投奔曾幕，为国效力，先后参与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参加康有为的海外保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直至去世前不久欢呼中国共和革命成功的原因。

杨笃信们在金陵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在太平天国辖区取得传教权。从杨笃信于“1860年12月6日在上海”（按此函似系倒填日期，盖此时杨仍在太平军辖区）写给伦敦布道会秘书的报告中说：“他们（太平军）不但在寺庙中，而且在人心中造成了留待我们去充实的真空。这就是传教士的工作，如果本埠各国公使没有采取一种奇怪的政策，这种工作是可以马上开展起来的。我到太平天国去的主要目的完全实现了。”

<sup>①</sup> 以上所引资料，见《西学东渐记》，第88~100页。



“我的目的是要从太平天国的首领得到一个宗教自由的诏旨。这个诏旨完全准许各派传教士进入或居住太平境内从事宗教工作。其中某些措词是夸张的，因而是令人不满的，可是主要的内容则是准许宗教的完全自由，不论基督教新教或天主教。诏旨中说：‘朕鉴彼等教士皆忠诚信实之人，愿为耶稣忍受各种患难而在所不惜，对此朕深敬之。’诏旨又令各负责官员传谕所有（太平军）弟兄优待各传教士。我在苏州向太平军首长出示诏旨，问他们能否帮助我找一所房子和教堂。他们说：‘当然，你来罢，一切都可办到。’这张诏旨是年轻的王子所写的，上面印有他的父亲的玉玺，现随函附呈，稍缓即当将译文寄奉。我坚信上帝将借太平军之力扫除中国的偶像崇拜，上帝将通过他们联合外国传教士，传播基督教以代替偶像崇拜。请英国的弟兄们更加热忱地为中国祈祷罢：要是这些人得到了成功，中国的偶像崇拜就为时不久了。我完全相信，如果他们在江苏省境内建立了秩序，那么江苏省在二十年内名义上就要成为一个基督教的省份了。同样的办法也可以用之于所有其他的省份。”<sup>①</sup>

关于杨笃信此次金陵之行，茅家琦先生转引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的两则史料，颇可注意。据载，当幼主签发《宗教自由诏旨》时，李秀成也在天京，他向杨笃信讲了下面一段话，并请杨转达其他外国传教士：

“你们获得福音书已历一千八百余年了。而我们呢？似乎只有8天。你们对于福音的知识应是正确的及广博的；而我们所有的不能不是有限度的和不完善的。所以你们现在应当容忍我们，而我们必将日渐改善。至于福音则同一无二，应传播于全世界。请令洋兄弟知之，我们决心根本铲除偶像，而以基督教代替它。”

<sup>①</sup>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380、381页。该书第381页收录了杨笃信所提到的诏旨全文。

另外，杨笃信从罗孝全处得知洪秀全仍坚持自己的宗教观点。杨笃信称：“天王告诉罗孝全牧师，必须毫不保留地相信这些事实（指丁酉年洪秀全升天亲见天父天兄以及天父天兄下凡数次等等——茅注），否则，当如以色列人之拒绝摩西而沉沦。”<sup>①</sup>

在前述杨笃信致伦敦布道会秘书的报告中，杨再三强调太平军正在迅速地大踏步前进，坚决在中国扫除偶像崇拜，用基督教去代替，认为，“他们无疑地存在着一些巨大的缺点，不过无论在宗教、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他们都比清政府前进了数世纪，我只有祝福他们成功。”相反，在1861年2月2日杨笃信所写的报告中则说：“现在鞑靼人自顾不暇，最近所签订的条约其价值全在中国现政府的衰弱，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幸事。”“满洲人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希望，而只能给我们带来不断的恐惧之感。他们是基督教和文明的死敌，他们毫不容情地坚决反对基督教和文明。可是目前他们尚无能为力。”“清政权是一定要覆灭的。在中国已无任何力量可以挽救它的灭亡。反之，如果列强不进行干涉，太平军就一定会得到成功。”

既然太平天国如此美好，那么，杨笃信为何不留下来，而要返回上海，甚至《宗教自由诏旨》也不准备使用而将它寄给布道会秘书呢？杨笃信于1860年12月18日在一封信中说出了原因：

“我从南京回来后，满想再去南京，留在那里，如果实际可行的话。可是经我再三考虑并与当局数度磋商之后，我认为目前这样做为时尚早……负责当局告诉我，扬子江即将开放，汉口、九江也要成为驻有领事的口岸。另外一支舰队就要巡阅扬子江上游，那时即可决定对于太平军的对策。我们把他们当作朋友还是当作敌人，尚属未定。如果不把他们当作朋友，我确信这是我们的错误。因为

---

<sup>①</sup> 参见茅家琦著：《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311页。

他们并不计较他们前往上海时我们对待他们的行为，而仍对我们怀着最友爱的感情。”<sup>①</sup> 外国在华传教士的目标虽然是传教，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不是个别传教士的印象所能决定的，一切都要以列强在华政策为依归。

通过上述杨笃信与容闳的记述，可知他们金陵之行的原委。他们往访的目的不同，可谓各有怀抱，但在他们的笔下，多少向世人描述了太平天国的宗教政策和对政治变革的态度。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对它曾抱希望的容闳，理性地剖析太平天国运动的两面性，可以说这是国人对该运动首次进行最为公允的评论，应当予以注意。

---

<sup>①</sup>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 383、382 页。